

=====
文革博物馆通讯（八七六）·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四四期（zk1608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自由论坛】	中国的乌合大众——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	苏晓康
【亡灵祭坛】	忆蔡达友	姚志修
【追根溯源】	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癫狂	袁 刚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自由论坛】

中国的乌合大众——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

• 苏晓康 •

暴烈、横行了十年的“文革”全民狂热，从刘少奇、邓小平的角度去看，是一个大灾难；但是从毛泽东的角度看，发了疯的亿万民众，居然是非常听话的，运动收放自如，从“天下大乱”轻易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我想说的重点。

暴民政治的最大典范，是法国大革命，所谓“雅各宾党人”、罗伯斯皮尔，再加上“断头台”，血迹斑斑，世界震惊。法国大革命弄到大家轮流上“断头台”的地步，革命者们身不由己，彻底的失控，最后只得由拿破仑出来收拾残局，复辟皇权。所以法国大革命砍皇帝的头，备受争议，这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常识。更重要的是，由于法国先贤们的努力，比如雨果的传世之作《九三年》等，使法国大革命成为“普世记忆”，又惊醒历史。然而，从1793年到1966年，一百七十年后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残暴得多的“革命”，却是由一个东方的“皇帝”亲自运筹帷幄的，这大概会让路易十六死不瞑目。所以醉心“群众革命”的西方新左派崇拜毛泽东，不是没有道理的。

民粹主义是暴民政治的温床，它的完成式是最终酿成“现代极权”，即列宁式政党对普罗大众的全能式统治——大众从反抗主体最后沦为奴隶。旧俄知识分子正是从法国雅各布宾党人那里接受了民粹主义思潮，主张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而列宁则将民粹主义者个人式恐怖活动，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化集体化的恐怖活动。

法国大革命使得“暴民政治”成为可能的研究对象，系统研究成果也出自一个法国人，即大家都熟知的古斯塔夫·勒庞的（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在这篇文字里，我基本上是希望借用这本书的观点来分析文革这场“民粹运动”。

一、文革群体

勒庞认为，人们为偶然事件或一个目标而聚集在一起，自觉的个性就会消失，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就获得了一种心理群体的特征，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消失、智力下降、感情彻底变化。他具体归纳了五点：

- （1）冲动、易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群体不会深思熟虑。
- （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其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
-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总是走极端。
-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 （5）群体的道德，有一种净化的倾向，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

把以上五点再浓缩一下，其实就是两点：低智商和受操控。

根据上面这些分析，我认为对文革中的群众行为做过高的评估和赞扬，很难不是偏颇的。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对文革的记忆、研究等，都显示出一种所谓“灯下黑”的局限，或者还有某种身陷其中、不容易撤离出来作工具分析的特征；我们很容易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却无力解构“群众的文革”。其实，我们把“群体心理”这个课题放到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来，亦即1960年代的政治社会思想状况下，不难找到大量的、非常生动的具体事例，去佐证勒庞从法国大革命中归纳出来的那些特征；或者说，文革结束四十年了，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自己的勒庞医生。

假如勒庞有幸遭遇文革，我猜他高度兴趣者，会是“文革群体”特征的成因，这也是我们研究文革时还必须添加的一个因素：前文革的驯化，对于文革群体的基本素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或者说，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已经花了十七年时间来操控、玩弄、虐待中国群众，他才有那么大的自信，敢于发动几亿暴民去摧毁他亲手缔造的这个党和国家机器。

前文革驯化，是个大题目，这里仅列其要点：

镇压与屠杀，造成恐怖氛围，吓阻一切反抗于萌芽状态——五零年代的一系列肃杀行为，如土改、三反五反、按指标杀人、前政权基层骨干一律“杀关管”等，一举震慑民间，从此鸦雀无声，所以才有邓小平“六四”镇压前所谓“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的经验之谈，中共将此再施用一次，果然铺垫了二十年经济起飞和权贵阶级的铸成。在这个概念上，中国人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吓破了胆的“群体”，这一点对于“文革群体”和后来的“八九群体”的性格特征，都很重要，恐惧永远伴随着中国的抗命运动，使之易于激进、失控。

用阶级划分，制造大众对“一小撮”的隔离——毛泽东是一个搞“多数人暴政”的大师，这套技术他是从江西苏区清“AB团”、延安整风反王明就千锤百炼出来的，“文革”给他在八亿人的更大范围中又试了一次；阶级划分的作用，在于从社会中隔离出一个“少数”的另类来，作为整肃和折磨的对象，从而又示范给那个施暴的“大多数”，令施暴他人以释放自身恐惧成为家常便饭，也是文革的一种常态。

反复搞运动，依次在不同阶层之间互换“加害者”与“受害者”——人人成为一个无所顾忌的施暴者，在任何一个尚有起码常识和秩序的社会都是做不到的，毛能做到的诀窍，其实很简单：他是在不同时间里，给不同的“多数”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标，“文革”中入狱近十年的作家张郎郎对此归纳了一个绝妙的观念：“安全暴力”，指施暴者获得某种心理安全。

用意识形态不断洗脑，以“集体”、“国家”代换“个人”，不止阉割灵魂，连话语也在潜意识中被改造——叫你只能说让你说的话。

所以“文革群体”是在这样的政治前提、思想素质、精神思维语言状态下，走进文革的暴风骤雨中。勒庞用的“乌合之众”一词，带有强烈的心理学意味，用这个词来描述文革中的大众，我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传统意义上已不复存在，因为上层儒家官僚机构、中层乡绅自治、下层宗法家族组织全部瓦解了，而取代它们的中共各级党委、各级政府也全部被摧毁了，这种状况下的民众，跟传统社会瓦解之后的流民、啸聚山林的造反好汉有多大区别呢？如果再加上前面所分析的“驯化”，这样的大众与1793年的法国大众，也即勒庞这本书里归纳的那些特征，又如何对比？也许将来会有人来做这件事。

二、“群众斗群众”是如何挑逗的？

群体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大众”和“领袖”两个问题。勒庞这本书里，关于“领袖”这部份的议论分析并不精彩，只是讲了一些常识，比如他说：

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

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勒庞这个分析，倒是很符合毛泽东，疯癫、无情。

他大致上讲了一个规律，领袖分两类：一类是勇猛、实干，另一类是意志力更持久，也更为罕见。

我们都熟知韦伯对政治领袖的一个著名分析，即所谓“奇理斯玛型”领袖，也叫魅力型寡头——他从社会学角度做的这个解剖，确实比勒庞从心理学角度的分析，来得深刻。勒庞也讲群体的幻觉和煽动家对群众的麻醉，但他只讲到领袖人物的所谓“名望”的魔力，就比韦伯的“魅力”低了一个层次。韦伯最精彩的地方，是说魅力乃转瞬即逝，不能反复使用；而且大众有一种对魅力的渴望和上瘾，这恰是领袖的致命之处——他最终会为了维持魅力而毁掉自己。这个论述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几乎可以从中西方古代的那些“英雄豪杰”，一直涵盖到近现代的枭雄，如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等，当然毛泽东也逃不过这个罩门。

毛泽东有“造神”的自觉，特别擅长勾引追随者为他“造神”，前有刘少奇，后有林彪；有趣又在，“文革”简而言之，就是毛泽东利用第二个“造神者”去摧毁第一个“造神者”；也因此，当第二个“造神者”坠毁温都尔汗之际，那把大火也顺便把毛泽东这座神像焚毁了。这些在今天都是老生常谈了。

但是，因为毛泽东至今还是中共的神主牌，他并没有遭到任何程度的解构，尤其他操弄大众至疯癫境地的这场文革，可谓他的登峰造极，对世界与中国至今仍是一头雾水。文革既是毛泽东的一个神话，也是解构他的一把钥匙，其中最有魅力的问题，是他操弄大众的伎俩，是不是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有待分析。勒庞也分析领袖的“统治手段”，比如他说“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这在毛泽东身上怎么表现的，是个好题目，但不容易分析。我觉得可以很容易看到的，有两点：

1、“两报一刊”指挥

毛泽东不过是使用了自己的几个秘书——连江青在此的身份角色不是毛妻而是一个秘书，再加上几个文痞，就指挥了这场文革，其指挥、控制的手段，仅仅是通过党媒（中国只有党媒）发社论，或颁发文件（另一个辅助手段就是周恩来在人大大会堂召集各地各派别代表谈判），几乎谈不上任何“想象力”，就是枯燥的文字命令而已，像军事命令一样畅通无阻到全国的所有角落，遇到抗命或阳奉阴违的情形也很罕见，八亿人和偌大一个神州被毛泽东指挥得圈圈转，这在人类历史上至少是空前的。

文革从“一张大字报”的发动，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收盘，全靠社论指挥，仅举几例即可：

文革的第一场较量，就是围绕姚文元一篇文章展开的，即所谓“舆论指挥”权的争夺，刘少奇一派便以损失“彭罗陆杨”四员大将而败下阵来。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向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私下组织。彭真、陆定一抵制转载此文，毛在上海还曾下令印刷小册子，由新华书店系统发行；而《人民日报》迟至11月30日才在《学术研究》版内转载此文，两端激烈争夺，而就在此文发表的同一天，杨尚昆以“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的罪名，被撤销中办主任之职；林彪也开始动手整肃总长罗瑞卿。自1962“七千人大会”后到65年这段期间，毛有部署地展开对文艺、学术的批判，如对戏剧《李慧娘》、《谢瑶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以及史学界批李秀成自述、哲学界批杨献珍、经济学界批孙治方等，此乃所谓“文化大革命”叫法的由来，因为毛觉得“大权旁落”，要靠自己的一帮秘书来发动反击。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是文革动员手段，但此举必须配合一个口号的传播，方能凑效。文革研究者何蜀曾分析过“造反有理”这句口号的出笼，也是有趣的一例。1966年6月9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公开引用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语录，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话是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讲话中说的，1949年12月20日新华社重新引用过，但后来并没有被编入《毛泽东选集》。27年后《人民日报》或许是不经意援引它，却令红卫兵们如获至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连写“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又经江青转递给毛泽东，再由《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以“革命小将的大字报”为题公开发表、配发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人民日报》转载这三张大字报，连续几天反复刊登这段“造反有理”语录，中央乐团奉命将其谱成歌曲，从1966年国庆节前夕开始，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全国传唱。

红卫兵一大血案，是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们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13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该女子中学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一只红卫兵袖章，而毛泽东听说宋的名字是“彬彬”时说：“要武嘛。”这是整个文革中直接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一次最赤裸扩的暴力诠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同时，这个瞬间也变成媒体传播、宣示暴力指令的生动样板。《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了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也在电影记录片里被作了突出报道。据王友琴调查，8月18日后北京校园暴力和杀戮全面展开，仅西城区8月下旬有333个人被红卫兵打死，61所中学平均每所中学打死五个半人。暴力攻击也急速延伸向校外，被称为“红卫兵杀向社会”，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不仅北京，1966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杀人场。

这里的含义是，不使用“枪杆子”——军队、警察等国家暴力手段，只靠它的威慑作用，毛泽东可以仅仅用秘书——在中共语汇里即“笔杆子”，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暴民运动，摧毁整个政府、国家机器和整个列宁式政党，这不仅在政治学上是一个大题目，恐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大题目。从常识看，在任何制度建制下，从皇帝到现代独裁者，不依靠官僚阶层（即所谓“科层制”），是不可能对社会作起码的控制和运作，仅仅靠“意识形态命令”（两报一刊社论）指挥文革十年，其机制至今是一个谜。

2、军管

毛泽东并非不使用“枪杆子”，从使用“军代表”开始，便意味着他是靠“枪杆子”收盘的，表面上的说法叫着“大联合”、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实际上这些步骤都是在“军代表”的看不见的枪口下完成的。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数据都还没有。然而，这个可以称为“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却是文革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整肃、虐待、枪杀、监禁最惨烈的时期。毛泽东除了五〇年代初期，曾滥施警察、军队等镇压工具之外，文革中“军管”是最赤裸裸的一次施暴，比如安徽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开膛破腹，就是一个军代表实施的私刑，惨烈程度超过六六年的“红八月”暴行。

然而，毛泽东的“军管”又很特殊，跟世界上许多“军政府”都不一样，也不是中共原有的那一套话语（“党指挥枪”）可以描述的。在文革这个题目下，至少可以有几个研究点：

——毛泽东达到清洗刘少奇的目的，就想恢复政府功能、“抓革命促生产”，回到常规，但文革闹到“全国内战”的程度，已经失控，他的权威也受到挑战，比如1967年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他几乎是仓皇逃离，所以他不得不打出他的最后一张牌“军管”。文革收盘用军队，就是强制性恢复秩序、收缴权力、结束“民粹运动”，毛很清楚这是不可能靠“笔杆子”发社论就能办到的。事实上“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在各省市都经历了一场剧烈派性纷争、武斗、人头落地、充满阴谋的过程——毛赖以发动文革的魅力也随之消耗，这都极符合韦伯的说法。

——毛泽东其实并无失权之虞，他靠林彪“保驾护航”，是把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变成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因此“军代表”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于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惨案又惊人地相似于那个时期的所谓“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纪西欧曾坠入一个疯狂迫害异教徒、“魔术师”的时代，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酷刑计有砍手、剥耳、烙刑、笞刑、浸泡、锁绑、监禁、罚款、放逐、卖为奴隶等，死刑大部分是绞刑，还有斩首、溺死、裂刑等，然后焚毁尸骸，对“巫师”特别是“女巫”则直接烧死在火刑柱上，意谓“防范巨毒”。六十年代中国的一场现代迷信，达到全民共谋迫害“异教徒”的程度，内幕也极其血腥，至今只露出冰山一角。

——放纵群众、煽动民粹，都是需要支付代价的，法国雅各布宾党人的命运终于也落到毛泽东头上——他靠军管收拾残局，却又不肯分权于林彪（设国家主席），终于引发“副统帅逃亡”的重大危机，也导致毛的“天纵英明”一夜尽失。文革灾难，林彪是毛泽东的第一帮凶，他的作用远甚于“四人帮”，当下民间盛行的“林彪冤案”是一个伪问题。

三、“民粹主义”流变

共产党这个东西，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它没有多少办法——为了公平、理想而滥施残暴、反人道，很难说得通。民粹主义衍生成“不择手段”，被解释为苏联专制的根源，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来自《斯大林秘闻》一书。

此书作者爱德华·拉津斯基是史学家，也是剧作家，曾花二十五年创作《末代沙皇》，畅销世界。《秘闻》认为前苏联的悲剧并不能简单归之于斯大林的暴君和独裁者性格。与其说是斯大林缔造了苏联历史，还不如说是苏共在十月革命前夕争夺、巩固政权中需要这样一位残暴的领袖。

俄国知识分子和青年贵族，受法国大革命雅各布宾主义的影响，接受民粹主义思潮，成为“十月革命”和列宁式政党的思想来源。民粹主义有三个要点：一是主张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二是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三是主张利用农奴服从成性的弱点，强迫他们走进新社会，甚至主张彻底消灭这个阶层。

列宁式政党将这三点完全继承下来。尤其，列宁将民粹主义者个人式恐怖活动，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化集体化的恐怖活动；斯大林作为他的接班人，对“不择手段”尤其心领神会，无所不用其极，不仅用于对付沙皇政府，也用在对付党内同志，发生包括“大清洗”和“古拉格集中营”在内的七十年罕见暴政，有研究发现，其惨烈后果包括导致俄罗斯民族的人口出生率长期低下。

无疑，“民粹主义”三要点也是被中共完全继承下来的，但毛泽东放胆玩弄“大规模群众”如文革这类把戏，则是苏共不敢望其项背者。毛泽东是一个搞“多数人暴政”的老手，这套技术他是从江西苏区清“AB团”、延安整风反王明就千锤百炼出来的，“文革”给他在八亿人的更大范围中又试了一次。如前所述，他的诀窍是在不同时间里，给不同的“多数”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标。“多数”能够为广泛的过激行为提供“理由”，就是民粹主义，但破坏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以更大的权威来恢复秩序，这是法国大革命催生出拿破仑专制的道理。中国这场“多数人的暴政”的情形很特别，最高权威毛泽东不仅是暴政的根源，而且他的权威始终没有被怀疑过，以至社会的法纪和道德一直走到全面沦丧的境地。

“多数人的暴政”在中国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施暴者”行为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又如在广西发生大量吃人暴行，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人伦防线不能抵御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还是它早已不存在了？本世纪初鲁迅说他从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只读出“吃人”二字，他绝对想不到，扫除了这个“吃人”的传统之后不过半个世纪，中国真的“人相食”了。这才是“文革”研究的最大挑战。人伦防线是一个文明最原初的成果，也是它最后的底线。这条防线在中国文明中是由儒家经历几千年逐渐建构起来的，却在近百年里被轻而易举摧毁了。

还有一点。文革和八九学运，两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两者最后的制度化结果，并未对民间社会存留什么积极的遗产，反而是刺激了中共体制处理“民粹运动”的马基雅维利技术。八九学运有意无意间在模仿文革，或者说，文革中的许多行为模式、思想方法，不可遏制地遗传到八九学运中来；而中共当局最初定性学运和最终选择调野战军进京镇压的决策，其潜意识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文革经验”。

我们现在面对和承受的现实是，“六四”镇压后，中共建构刚性“维稳”系统，返回“全能主义”控制，不惜一切代价压制民间的任何意愿，并成功达至低人权、低福利、高污染、高腐败的“经济起飞”，得以配合跨国资本大公司完成“全球化”，由此中共塑造了一种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中国模式”，虽然这二十年间国际社会接连发生了“苏东波”共产体制坍塌、中东“茉莉花”民间抗议风潮两大成功的“公民抗命”运动；这意味着中国的经验解构了西方关于“经济发展必定促进政治进步”的预期，提供了关于“公民抗命”的相反实践。中国在一个极短促历史中的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竟然走向彻底相反的结论，这是非常讽刺的。

□ 原载《民主中国》

~~~~~  
【亡灵祭坛】

忆蔡达友

• 姚志修 •

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概况——据可查阅的公开资料，所谓“五一六集团”是指在文革时期的1967年6月间成立的“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其矛头针对周恩来和国务院。经毛泽东授意，陈伯达、江青等出面，在群众造反派的打击下，该组织于1968年全面崩毁。但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全国性清查运动由此展开。凡为各级掌权者视为异己分子，均属清查整肃之列。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倒台后的1970年8月被指认为该集团的操纵人。毛泽东和林彪更于当年10月分别指示务将运动进行到底。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被列为该集团的为首者。人为随意制造的这场阶级斗争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中央说，清查“五一六”是“四人帮”及其各地代理人制造的假案。在此运动期间，全国约有300—1000多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数十万人被打死、自杀、致残、逼疯。在清查期间，我属于怀疑和监控对象，而学友蔡达则被逼自杀。

清华物八年级时期（1962—1968）蔡达与我不在一个小班，平素接触不多。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讲纯正北京普通话、谈吐温文尔雅的同学，1964年几次参加歌颂党、歌颂领袖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演出。据同宿舍同学回忆，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1968年冬毕业分配末期，他在8号宿舍楼主动告诉我，我俩分配到安徽省重工业厅所属的803地质勘探队，队部设在繁昌县的桃冲。繁昌通铁路，东经芜湖，北折可抵合肥，东往可达南京、上海，交通很便利，他显得比较高兴。我们相约按规定在年底前去报到。

直到1969年的元月2号，我才在芜湖换乘长途汽车到达繁昌桃冲。下车后我沿斜坡向上往大队部走，只见蔡达像小鸟一样，从队部的二楼招待所飞奔下来，跑到我跟前连连埋怨道：“你怎么迟到了？我早就报到等着你呢。”我回答说，因上海家里有事耽搁了，元旦放假，元月2日报到与12月31日报到是等价的。蔡达、我和清华工化系、北京工业学院分配来的几个毕业生一起在招待所住了几天，我听他们说桃冲有一个开采多年的中等铁矿，采矿作业面在地下数十米至上百米，该矿与地质队关系不错，就提议大家要求队部安排我们去地下矿参观。蔡达马上阻止我说：组织对我们十分关心，让我们领了价值超过百元的劳保用品，工人师傅连夜加班，给我们每人制作了木板大床，我们来是接受再教育劳动锻炼的，不宜提参观要求，不要给组织增添麻烦，还是早点下基层钻机组好。我说，劳保用品是沉重的翻毛大皮鞋、上下短身厚雨衣、带胶手套，木板床重得两个人抬都费力，说明我们将要在

钻井组从事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怕我们分下去后，再也没有机会集合在一起来参观地下矿区了。但我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没有向领导提参观要求。只隔了一天，我们清华四人便分到铜陵新桥的四分队，蔡在3号机组，我在5号机组，工化系的孙崧城在4号机组。3、4、5号钻机场地开始时相距数百米，半年后相隔几座山。刚到四分队时，这三个机组的20余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蔡达经常在蚊帐里掏出其妻子笑容可掬的照片看，照片背面写着一行秀丽的字“她永远向你微笑”，蔡成了我们劳动锻炼大学生中最幸福的一个。钻探工作实行三班制，钻机有时安置于稻田，有时定位在山坡，昼夜运转。我俩碰见的机会不多，蔡达很安稳，偶尔见面私下表示不知这样的锻炼何时才结束。

1971年社会上和勘探队开展清查五一六时，他在南陵县，我在铜陵县。我们自知不是五一六分子，都很坦然。有一次他托人捎信给我，说他爱人来探亲邀我去小聚，我就搭队里的卡车去了。为显示我俩见面的公开性和说话方便，蔡达带我坐到山丘竹林边交谈。工人师傅从我们面前十几米的路上经过，打趣地喊：你们两个五一六在密谋什么？我们哈哈大笑回答：是啊，是啊，你也来参加吧。他们夫妇招待我一起吃饭，我才知道他爱人姓周，是淮南市的老师，优雅大度又十分聪颖。据蔡达同事说，蔡工余时常与妻子下一种五角星棋盘的跳棋，多数周赢蔡输。

以后清查运动变得越来越紧。文革初期，蔡达曾在首都红卫兵的合肥联络站待过，而我是杭州联络站的人员。我们俩以不同形式被管制了：我原先一个人在山下给水站值班，被重新发配到山上钻机组干集体活；不得听取9·13林彪事件中央文件对群众的传达；走出驻地须请假；队部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不远百里，来为我们钻机组表演节目，一位斗志昂扬的胖女孩边歌边舞，手指着我鼻子厉声吼道：你，你，你，你就是五一六！对蔡达则更严厉，在没有任何文件出示告知的情况下，将他从钻井组调出，隔离到大队部的小房间，专案组整天吩咐他写交代材料。我听说他在大队部情绪低落，一天趁被叫到大队部接待外调的机会，天黑后借机去招待所储藏室取被子，特地到储藏室对面的小屋看望他。蔡达对我说，文革初期他在合肥联络站没有做过坏事，专案组要他揭发的几个对象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均还担任着省市革委会的职务，并且经常出现在报纸的正面报道中，他实在想不通。他还说，一起分配来接受再教育的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的胡某，现在进了政工组，成为管他的专案组副组长，自己肥皂短缺，向胡借块肥皂他都不肯。我说：胡某是组织的人，当然政治第一，与我们不一样，你何必在意，肥皂可向大队部梁某等其他同学借。我进一步宽慰他道：一场运动，长者二、三年，短则一年半载，我们见得很多了，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第二天上班时分，革委会严主任将我喊去训斥了一顿，说有人揭发我昨晚去蔡达房间通风报信。我申辩道，我睡招待所被子薄，去储藏室取加被，刚好看见对面的蔡达，随便聊了几句，没有讲要紧的话。

不久我接到上海母亲病重要我回去的电报，翻了几座山去分队部请假没有获准，只得跨越两个县去大队部告假。我在大队部办公室听说蔡达基本不与人讲话，一日三餐总是等大家餐毕离开食堂后才单独一人去吃饭。开饭时我就故意很晚去食堂，想在那个公共场所与他见一面，但左等右等没有等到他来。我只得走出食堂回招待所，路上正遇到蔡达拿着两个空碗去食堂，我走近他，没有问候，只自言自语地大声说：“我因母亲生病来大队请假，准备明天回上海。”算是正式与他打个招呼，他正视我一眼后微微摇头，示意我不要多说……这是我俩最后一次的面对。临离开大队部时，我又被军代表喊去训话，他严厉地说：看在你父亲烈士的份上，让你回家看望母亲，在火车上要好好思考自己和别人的五一六问题！

1971年的冬季特别冷，临近年关下了大雪。1972年农历正月初三我一个人在山上钻机值大夜班，同班组的地质队原团委书记摘帽右派高某早晨8点来接我班，他走进空旷的帐篷目无旁人地大声宣布：我们队里另外一个五一六见马克思去了！我心里一惊，没有理



睬他，披上大棉袄就下了山。以后听说，周老师大年夜带着一周岁的儿子乘长途车来桃冲探亲看望蔡达，队领导不让他们一家三口单独待在一起，更不许他们住在一起，要求周翌日早晨赶回淮南。蔡受不了刺激，初三凌晨悬梁自尽，发现时胸口尚温热。队部又叫周老师从淮南赶来，要她与蔡达划清界线。

蔡达的骨灰盒一直存放在保卫组，据说天阴雨湿时里面的工作人员很害怕。1973年秋后地质队的清查运动逐渐冷却熄灭，保卫组要我转请蔡达亲属处理骨灰。蔡达母亲和周老师复信我，说蔡达平素敬佩周总理的清白为人，嘱我将蔡的骨灰撒到长江里。受托后，我和孙崧城同学向队部要了辆吉普车、五元钱，买了一瓶好酒，抱着红布包裹的蔡达骨灰盒，驱车到荻港长江边，花钱雇了一艘民船。船行驶到江中央水清处，我俩将蔡达的白骨片一小把一小把、肃穆地撒到清波中，最后洒洒入江祭奠。在周老师帮助下，1974年我以视力差不合劳动保护要求为由，从地质勘探队调到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工作，从此改变了生活轨迹。我是地质队30多名劳动锻炼大学生中第一个调离的人。

在周老师等不懈坚持下，1979年5月11日中共安徽省委形成中发（1979）40号通知文件。通知说，清查蔡达等人的案件“是‘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办案路线的一起假案”，决定给“在学习班中致死的蔡达同志”“予以平反昭雪，由原单位负责做好善后工作。”文件还说，牵连此案33人，有名有姓的8人，其中3人受迫害致死。但文件没有具体指明谁是“四人帮”在安徽推行这条修正主义办案路线的代理人。

蔡达父亲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资深俄语翻译和编辑，曾翻译出版过《托尔斯泰夫人日记》。改革开放后，蔡达儿子获国内学士和硕士、美国博士学位，现在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工作。清华工化系8字班同学和地质队同事孙崧城获美国博士学位，在加拿大的一家化工企业工作至退休，他说地质队的经历终身难忘，在清查五一六时，有工人密报他说过“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反动话，他在接受政工人员查问时答：此话是毛主席说的，才得以解脱。

回首往事故友感慨万千。在那个压抑昏晦的年代，蔡达美好的小家庭就这样被莫须有的清查运动彻底破坏，而我等芸芸众生则无时不在惶恐中生活。我们的心深深打上了文革痛苦的烙印，终身难于忘却。

作者简介：1944年生，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8届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追根溯源】

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癫狂

• 袁 刚 •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今50周年了，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不同研究，中国官方也否定文革，但给出一个“历史决议”划定一个框框后，就不准再深入剖析了。其实，文革的根子及牵涉面既深且广，囿于种种限制，国内对这场劫难的反思分析还很不到位，以致近来缅怀赞颂文革的势头火旺，有人甚至希望中国再来一场文革。

文革“史无前例”也怪诞离奇，说其是一场“革命”也好，“浩劫”也罢，都须追溯源头，说清楚为什么当时中国会发生一场如此规模的“伟大运动”。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文革绝非中国的孤立事件，需要放眼世界探明其国际背景。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一环，其性质是意识形态革命，或曰意识形态癫狂！是国际共运遭受全球失败后，中共绝望地奋力一搏。文革失败也标志着支撑其发狂发飚的高调意识形态的破产，从反面为邓小平“拨乱反正”另寻出路提供了口实。没有文革这个“反面教材”，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改革将难以启动，说清楚文革与改革的关系，对于当前“深化改革”清除意识形态障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文革起因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受挫

1966年平地一声春雷，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前中国也一直在热火朝天干革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始，中国革命就纳入了苏联式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1949年中共建政，并非革命胜利或终止，而是新的起点新的阶段，直到文革发动的17年间，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漫长的革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东欧各国，目标及阶段性目标都很明确，即步步实现共产主义！这场世界性的革命，可称之为“共产革命”。

共产革命虽漫长，长达百年须几代人的接力，但绝非遥远至看不见摸不着。斯大林、毛泽东乃至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等领袖，考虑的就是及身见到共产主义，种种革命与建设，也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他们的言论当时都是公开的，在报刊上随手可查到。广大共产党员“干革命”，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连我辈“少先队员”们，也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些事实人所共知。而这也正是文革发动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在文革发动前的1950—60年代，中苏都热情洋溢地力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都没有成功，共产革命遭到了全球性挫折。怎么办呢？中共领袖毛泽东所谓“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文革即是他作出的回答。

追溯源头，共产革命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讲“游荡的幽灵”，是共产主义而绝非社会主义。马、恩所说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组织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绝非遥远，因现实条件所限一时无法达到，后来人们才有作为短暂过渡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但马、恩本人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太多的论述，且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欧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列宁虽讲社会主义，但作为过渡也只是个短暂时间，顶多也就几十年。列宁论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垂死即将灭亡，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实践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就在眼前。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常演说共产主义社会自己虽看不到，但听讲的年轻人能见到！并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一次他还具体把脉说：“现在50岁左右的人，不能打算见到共产主义社会，但15岁左右的人能见到并将自己建设共产主义”。按列宁的推测，最晚大约20世纪50—60年代，共产主义社会将降临人间。

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苏联不惜代价作了巨大努力，理论上也不断“修正”“创新”。斯大林掌权后断言共产主义可在一国首先实现，而非马、恩所说在英、法、德、美带领下全球同步进入。随着工业化完成和苏联宪法公布，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宣布：国家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然此时的苏联虽初步实现工业化，农业却因集体化饿死人千万，“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政治上“肃反扩大化”把屠刀挥向党内，而被处死的大

理论家《真理报》主编布哈林的遗言竟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二战“延迟”了苏联迈入共产主义的进程。1953年斯大林死，赫鲁晓夫掌权后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口号。1961年联共（布）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被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党纲”，宣布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比列宁的预测已迟了20多年，但苏联大张旗鼓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止。

由苏联一手操办并完全按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也以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虽最初党纲有“最低”、“最高”之分，但“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也并非遥远。1927年初北伐军进入上海，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毫不隐晦地向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声言：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引起轩然大波，并成为蒋介石“清党”的口实。中共也参加国民革命，后毛泽东亦有“新民主主义”的论述，但对共产革命却一直未遑多让，凡反对者或有所迟疑的都是反动派。共产革命前的所有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都只是短暂铺垫，凡跟不上步伐者即可能堕为反革命。申请入党者憧憬的都是美妙天堂共产主义，而非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更非短暂过渡的新民主主义。20年代初邓小平在苏联填写个人简历，满怀激情地写着要将自己的“身子”交给党，为共产主义贡献一生。赵紫阳回忆：

“我们最初闹革命时就是信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因为当时我们、国外都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罪恶，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文革中被批斗冤死的张学良弟弟共产党员张学思，临死前表白：“忆今生愚氓迟钝殃祸自取，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1975年周恩来临死前，在医院仍撑起病体，用颤抖的笔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这位也身染重疾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早治眼病”，毛、周临终之际，都记挂着共产主义。长期主管中共意识形态当了30多年中宣部长的陆定一说：“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虽遭文革残酷迫害，平反后他见到老战友李雪峰，仍表白：“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这一切都说明：中共革命就是要及身建立共产主义。

中共建政《共同纲领》虽打新民主主义牌，但不出数年就违背承诺，搞起了社会主义改造，进而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赵紫阳说：“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1958年再搞共产主义，结果是越干越落后”。所谓大跃进，就是要“跃”入共产主义。斯大林的死亡，让毛泽东有了争当国际共运老大的机会，他提出“超英赶美”，要与“老大哥”苏联竞赛“穷过渡”。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讲绝对平均，大获毛赞赏。薄一波回忆毛当时说：“大概十年左右，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时干部群众对共产主义议论纷纷，都认为人间天堂就在眼前，河南修武县制订了3年丰衣足食，5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莒县制订了大战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共产主义“狂热”，绝非偶然！也并非毛泽东个人好大喜功，因为马克思既早已“科学地”断言：资本主义灭亡不可避免，列宁预测1950—60年世界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扬鞭催马，就必然要求大干快上。若要等个千年万年才能进入共产主义，还要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干什么呢？那不是背离了信仰初衷吗？所以共产主义容不得等待！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否则马列主义还算不算数？按列

宁帝国主义理论，毛说资本主义世界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甚至发出战争叫嚣，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为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不惜一战！“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狂热的中共领袖多次声言，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公然在各国共产党峰会上重申：“我们不当害怕战争，我们不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什么样的战争爆发，常规战或核大战，我们都将赢得胜利。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那又怎么啦？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听者无不怵股震惊，毛则泰然自若。毛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出共产主义的几次讲话，均集中在50年代中期，这绝非一时兴到出之意气，而是有其深刻原由的。因为马列预言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限已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多少事，从来急”，时间不等人，不干不行啦！所以对内大搞大跃进“穷过渡”，对外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迫不及待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时也说：2000年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

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对苏联、中国及国际共产主义阵容都是严峻考验，两大阵容互相叫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然而西风猎猎阵阵强，马列学说在实践中到底是无法兑现，共产主义壮志豪情被残酷现实击了个粉碎！大跃进非但没让中国过渡到共产主义，反而闹了个饿殍遍野，“老大哥”苏联也始终无法进入共产主义，且专制愈烈国势日颓。帝国主义垂而不死，其时美、日、欧正酝酿新的微电子技术革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世界革命连影子也见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却分崩离析，中苏竟闹意见分道扬镳。虽然毛打肿脸充胖子加大力度支援世界革命，到处扇风点火搞反帝反殖武装斗争，但中国连台湾也解放不了，谈何解放全人类？国际共运前景并不看好，国内人民也饥寒交迫，共产主义根本实现不了，怎么办？中共头头毛、刘、周、朱、陈、林、邓，要作抉择要予回答！

1965年9月29日，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在国庆记者招待会上突然发飙：“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让帝、修、反一起来吧，他公开点了美国、日本、印度的名，同时也暗示了苏联，“四面八方的反动派一起都来进攻中国吧，我的头发都等白了！”说起来似乎豪气冲天，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底气，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内外交困。文革前夕陈毅元帅莫名其妙的战争咆哮，“迅雷发叱咤”，反映的正是中共在国际孤立状态下末路穷途的焦躁心态，其发狂发飙反映的是中共对全球共产革命失败的绝望。如何应对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后怎么搞？中国向何处去？中苏之间及中共领导层出现“路线之争”，已是势所必然，感情用事不服输，应对无方穷折腾，则中国要出大事会有动乱也是必然！

二、文革是高调意识形态“革命”

面对共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的应对大致可以分为三派。毛泽东以发动文革作回应，是继续革命斗争派，简称“斗”派（毛派）。另两派可概括为“改”派和“拖”派，改派即务实改革派，以赫鲁晓夫及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拖派不改也不革，继续愚民欺骗共产主义就在眼前，走老路拖一年算一年，勃烈日涅夫集团为其代表。斗、改、拖三字，述说的是一幕大型历史剧，反映的是上世纪60年代后国际共运惨烈的“路线之争”，其时代特征毛概括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1956年苏共二十大是国际共运的转折点，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了红色苏联的阴暗面和斯大林的罪恶，开始扭转国际共运激进方向，对外求与西方缓和，对内搞“物质刺激”改革，提出“三和两全”，与强大的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赫氏冷眼相观，最后是公开批评，终于触怒了毛泽东。但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毕竟失败了，毛被迫收缩战线，自己“退居二线”，让刘、邓出面收拾烂摊子，内心却如油煎汤煮，不服输还要缠斗！“天地转，光阴迫”，今后怎么办？理论上得有说法，实践上得制定新的路线，否则，执政合法性会受到挑战，弄不好得下台。毛于是将矛头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在国际上发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与苏共论战，发表了“九评”。国内则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阶级敌人及帝、修、反发起凌厉攻势！理论上也有所“创新”。

其实赫鲁晓夫并没有放弃马列旗帜，他在尝试改革的同时，也兜售“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却被毛批为“现代修正主义”。改革也得罪了党政干部既得利益官僚，在内外交逼之下，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退休”。此前中共曾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之九），专批“赫修”，此文毛曾动笔修改，亲自写了一段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以说明苏联已变“修”，共产主义是“假”。佛教居士赵朴初写了散曲《哭三尼》，戏谑帝、修、反头子肯尼迪、尼基塔、尼赫鲁，1965年被毛亲自推荐到《人民日报》上发表。毛壮怀激烈，嘻笑怒骂，“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虽辞气不挠，却也和陈毅元帅一样，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文革前夕中共高层悲情弥漫，纠结于空洞的意识形态，政治生态已是极不正常。

然苏修继位的勃列日涅夫们，却并不理会毛的挑衅，他们不顾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按既定方针继续实践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搞起了掩耳盗铃把戏。1967年苏共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一步之遥，至于那一天宣布进入，则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实际上是无可奈何耍无赖。对此中共进行了无情揭露批判，文化大革命提出反修防修，针对的就是苏联，也是做给苏修看，毛说“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马列新路来。

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在现实中不能兑现，毛于是断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将原来预设的短暂“过渡期”，无限扩大为“相当长”，到底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文革中毛曾对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说“反修要坚持一万年”，齐氏求减，毛答应“减少两千年”，齐氏求再减，请中苏和合，毛回答“不再减少！”林彪插话：“坚决不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共产主义何时实现？已是天晓得！毛也不过是挺直腰杆耍赖皮。按照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虽实现不了，但不能放弃，还要继续革命，更要斗争要专政，因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于是将斗争矛头转向了党内，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毛不满刘、邓为整治“大跃进”后遗症，向私有制退缩搞“三自一包”，认为是追随赫鲁晓夫。警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并说中央不听我，就带林彪上山打游击！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发动即从意识形态下手。

老毛“倒海翻江”穷折腾，中共务实求治的一线领导“刘邓陶”、“彭罗陆杨”、陈云、邓子恢等，对于发动文革竟不能有半点制约，反而是坐以待毙应声而倒，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毛早已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苏式政教合一政体，教在政上，谁掌控意识形态，谁

就执掌了政治话语权。文革中毛曾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他独衷情于“导师”，即红色教父，这比当主席当总统要强万倍。毛的拿手好戏是操弄意识形态，文革的性质就是高调意识形态“革命”，所谓“文化”，指的就是意识形态。毛提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毛式造反口号：“破旧立新”、“兴无灭资”、“反修防修”、“斗私批修”、“触及灵魂”等，都是从马列意识形态“纯洁性”出发，以教执鞭，以教杀人！举重若轻打击一大片，若单纯使用行政力量，抑或是动用军队，都无法达此效果。由此毛敢当面训斥二把手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动动小手指，就可将你打倒！”1966年“8·18”检阅红卫兵，已失势的刘少奇在天安门上对伍修权说：“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反复地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大”。但毛“一句顶一万句”，可以将蚂蚱说成是凤凰。毛自己写的“炮打司令部”，也谈不上是共产主义文献，然经由教主说出，立即着了魔。毛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简化为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于是成了文革关键词，整个国家瞬间即陷入宗教般的造反狂热。

十年文革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特景观，轰轰烈烈却又癫狂错乱，整个国家自上而下一派狂热，激情抑制了理性，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压制了人性和基本伦理，路线斗争让人是非不分，阶级斗争使人心灵扭曲，斗私批修让夫妻反目、父子对垒。文革发动的基础，是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本质上是一场愚民运动。本来大跃进失败共产主义实现不了，不仅毛的声望下降党的威信也降低了，但党加强了封闭式宣传灌输，隔绝民众与外部世界的资讯联系，妖魔化“帝修反”，毛大搞“政治挂帅”个人崇拜，使其威望不降反升，亿万民众充盈着愚忠心态，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李慎之说文革是“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同最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形成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统治的极权主义”。毛被捧上神坛，蛰伏多年的毛妻江青公然走上前台，颐指气使到处煽风点火，经长年洗脑的红卫兵小将，一经教唆就大打出手，“破四旧、立四新”，充当闯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江青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有如宗教裁判所，谁革命谁反革命凭其一句话，一出口就置“第四把手”陶铸于死地。长期愚民宣传造成意识形态癫狂，看过彭德怀“自述”而有所醒悟的首都红三司司令朱成昭说：文化大革命“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文革对知识的践踏、对人的戕害、对道德和法制的蔑视，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与破坏。叶剑英元帅后来披露：文革有1亿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250万干部被批斗，非正常死亡人数无法统计。

值得注意的是，虽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但毛仍一刻也没有忘记实践共产主义。文革有一出戏说：“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就真切地反映了老毛心思。也就是说，上世纪50年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受挫后，毛仍魂牵梦萦耿耿于实现共产主义！

早在1960年经济最困难时，毛泽东就派其亲信侍卫汪东兴到江西，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在小范围仍实践着共产主义。文革时更下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竟停止全国高考10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最近戚本禹撰文回忆1966年文革之初，亲聆毛讲“五·七指示”。毛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毛侃侃而谈马克思批评哥达纲领，及东汉末张鲁设置义舍，“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时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提交的一份部队办农场养猪的报告，竟又引发了毛的共产主义遐思：“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领导也要定期劳动，和大家打成一片”。毛认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陈伯达表示：“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于是发布“五·七指示”，党政军民学都“走五·七道路”，工厂、学校办“五·七农场”，机关办“五·七

干校”，实践共产主义。毛的空想立马变成行动，却又害苦了一大批人，林立果说是“变相劳改”。

文革发动与共产主义仍干系不断，“五·七”指示发布后，不几日就发布“五·一六”通知。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获得毛泽东高度评价，因为“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然2月即遭叶剑英等老师质疑，却又被毛斥为“二月逆流”。在将集体化等同于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狂热气氛中，文革大反“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对“八级工资制”，破资产阶级法权，贯彻“破私立公”，坚持“一大二公”，批刘、邓为“走资派”。时26军政委程世清少将率部入江西“支左”，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见到疏散于南昌的陈云，说要在江西搞大跃进，1970年程果然在江西搞起了共产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拆旧屋建新房，农田建设统一标准，并编了顺口溜：“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在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坡上”。“共产经”念起来顺口好听，却再一次把江西老表折腾苦了。文革中“共产风”再次在全国刮起，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5年普及大寨县，勾勒未来集体化路线图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仍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毛说：“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基础上，毛又提出“革命加拼命！”号令亿万民众不计报酬蛮干，做社会主义大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中国人口太多“大锅饭”实难吃饱，毛转而指示刚获政权的小国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曾指派张春桥帮助波尔布特起草“社会主义宪法”）推行比中国更左的政策，废除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夫妻家庭关系，连城市也不要，统统到农村过集体生活，全民“吃大锅饭”搞共产主义，结果又饿死人百万。

然而，直到1976年毛死，共产主义无论在苏联、中国还是柬埔寨，都未见踪影。这年元旦毛调侃式地刊发了《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这首词写于1965年秋，立意为反修，讽刺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文革发动时还大量印发了一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书，以几个留学苏联的日本大学生的观察，说明苏联社会已经蜕化变质，我记得其中谈到苏联青年人喜欢穿“牛仔裤”，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也是“变修”的表现，现在看来十分可笑。但毛式共产主义又是什么东西呢？文化大革命作了尽情的表演，实际上比“土豆烧牛肉”式“仙山琼阁”还要荒唐。所谓“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亦工亦农”的“五·七干校”，还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滚一身泥“脚上有牛屎”，“斗私批修”做共产主义的“新人”等，其实是落后的小农式共产主义，是反智反资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十年文革“探索新路”，并没拿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答案。毛无法在事实上、物质上拿出好的共产主义标杆，就转而求诸精神，在意识形态领域穷折腾，活学活用毛著作，大树新人新事新风尚，精神变物质，以求“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实际上是上演了一场愚民滑稽剧。这场戏越往后越难演，但毛老了行将入土就木，也就顾不得那么多，还要狂斗下去：“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三、文革癫狂的反面：改革与开放

文革所谓“共大”、“五七干校”、“新农村”、“大寨县”等，继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让中国民众再一次遍尝毛式小农共产主义的滋味，赵紫阳说是“越干越落后”。文革时“在地狱中坚持思考”的思想家顾准认定：“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文革失败，宣告了马列毛高调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破产！乌托邦终究为虚假，高调再怎么唱，也只能是空对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列毛主义并不是被人驳倒的，而是被百年实践证伪。上世纪后半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惨遭失败！苏联垮台是一个标志，中国文革破产也是一个标志。普京说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柬埔寨波尔布特一伙更受到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审判，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被官方彻底否定。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实现不了，西方不亡反而蒸蒸日上，已经表明马列主义不是“真理”，马克思没有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十月革命也没有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老毛不服，想另辟蹊径，在死胡同中穷闹腾，文革也算一场“共产主义试验”，是没有希望的垂死挣扎。

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文革癫狂作为反面教材，让国人领略了共产革命的丑陋荒唐。赵紫阳说文革让他“大彻大悟”；胡耀邦说：“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不能再癫狂胡乱革命了，要回归常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私有制发展。所谓拨乱反正，就是要正常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道，“与国际接轨”。胡锦涛也说“不折腾！”

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讲，就是不搞马列毛主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搞修正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的说法是“打左灯，向右拐”。毛指称刘邓为“走资派”，并没有说错。但不搞市场经济不搞资本主义，中国就发展不起来，中共也撑不下去，境况将更加悲惨。马列毛主义被实践证伪，刘邓、赫鲁晓夫等改革派较开明，想另寻出路。勃烈日涅夫等腐朽平庸的“拖派”（这种人在中国多得很，当今尤甚，所谓“维稳”者，恕不具名）无所作为，只能是等死。激进的“毛、张、江、姚”意识形态“四人帮”，枉顾现实缠斗蛮斗（国际上格瓦拉、波尔布特也属“斗派”），只能是给人民徒增灾祸。周恩来、康生集团曲意奉承（康生是周恩来“特科”老部下，临死时按周旨意揭发江青、张春桥为“叛徒”，康老奸巨滑其实更象周之为人，将其说成是“四人帮”一伙，是极大的误会。康的秘书李鑫更最早提出逮捕江青等），助纣为虐；林彪、陈伯达等先是入伙加炊，后被抛弃，这些人均属“斗派”。“斗派”只要圣教圣旨，不顾人民死活，“改派”虽也不弃圣教，但心中装着人民，乞望人民能有口饭吃。务实改革派在理论上“站不住”，却是共产党的唯一希望，况且邓小平及其继任者还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切实目标，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

毛泽东一世枭雄，对于自己的失败命运是否清楚呢？应该是清楚的！毛临终前说文革“搞不好就血雨腥风”，“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怕遭清算。他固执地说一生只干了两件事，文革即其一，容不得任何人反对，且“七八年再来一次”。他再次打倒小平，却也留了一手，未开除党籍。毛、邓都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信仰都很坚定，对苏联模式都有不满，都主张有所改变，斗与改，是一个硬币的左右两面。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对毛也震动很大。毛的秘书胡乔木说：“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毛并说：“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还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这些言论反映出的毛比“右派”还要“右派”。当然，这都是毛死后胡乔木等人的追忆，毛在何种情况下说过这些话，当时人民并不知道。

然而形势比人强，虽然广大民众被禁锢，以为国外水深火热，有待我们去拯救，但高层知晓西方世界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革命，经济在蓬勃发展的事实。故陈伯达1969年为林彪起草中

共“九大”《政治报告》，将列宁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改为“电子化”，一字之改，颇具见识。林、陈也主张发展经济，却被斥为“唯生产力论”。赵紫阳说：“其间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毛则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人数多，开始把“计划生育”纳入其乌托邦工程。当时报刊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的部署是“斗、批、改”，对苏式干部官僚体制下狠手，“踢开党委闹革命”，又建立“一元化领导”的革命委员会，还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林彪事件打乱了毛的部署，文革逐步失去控制。毛改革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朝“左”的方向。毛并非不清楚东西方差距在拉大，却头撞南墙不死心，内心很是纠结，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最后对文革竟不知如何收场，在“接班人”问题上举棋不定。

但中国的发展航向，在文革后期还是决定性地改变了，不是朝共产主义，而是向资本主义！这就是1972年中美破冰，结成准同盟共同搞垮苏联。

文革“反修防修”，1969年在“珍宝岛”伏击苏军巡逻队，虽然苏联以牙还牙在新疆铁列克提也歼灭了中国一支巡逻队，却仍不善罢甘休，企图用核武器对中国动“外科手术”，并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毛提出“社会帝国主义”概念，将苏联视为中国“头号敌人”，发出“备战、备荒”动员令，林副主席发布“1号”疏散令，全国“深挖洞、广积粮”，形势十分险恶严峻。中共宣传部门后来描绘毛指挥若定，大手笔主动改善中美关系，乒乓外交“小球推动了大球”。其实恰恰相反，主动方是美国，尼克松总统不能容忍苏军坦克象入侵捷克那样侵华，警告“新沙皇”不许对华动用核武，并主动在华沙、维也纳追着中国外交官通报，毛是被动被迫接纳了美方好意，老帅们研究当时局势，也认为联美制苏是好棋。毛于是在中南海与素有“反共老手”之称的尼克松总统握手，“结成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语）。

20年不到，毛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叫嚣美帝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红世界，到投入美国核保护伞下，共同对付北极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先前哭丧“三尼”，如今却盛情款待第四个“尼”（克松），翻云覆雨确为政治变色龙，苏共指责毛为国际共运的“叛徒”，一点也没冤枉。但毛也无所畏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生怀抱政治浪漫主义。田中角荣首相来访，毛主动不要日本二战赔款，在地图上将北方四岛改画归日本。中美、中日破冰，实际上是中国向西方世界开放的开始，所谓“大分化”、“大改组”，“三个世界划分”，都是乱弹琴，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晚年毛也顾不得国际共运前景了，反而坦言右派朋友更可靠，对尼克松说反帝口号都是“放空炮”，不必当真！联系起上述胡乔木等追忆的毛“右派言论”，毛到底是左还是右，或“形左实右”，似乎就很难说了。然毛属“斗派”极左不成问题，“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极左理论，毛的一生作为，都说明他是一个马列激进左派！1973年毛还令江青等批斗周恩来、叶剑英对美软弱，是“投降派”，最后又不了了之，说明毛当时对联合美帝反苏修，内心也很纠结痛苦，崩得紧紧的意识形态这根弦，很难很难松解。而上述一切又当作何解释呢？说明即便象毛泽东这样狂热死硬的共产主义极左分子，在世界发展大势严酷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弯下他那傲慢的身躯，接受共产主义失败的事实，虽然内心百般不服，却也无可奈何。高调意识形态是欺骗人民的，一阵癫狂之后，一切都归于零。

总而言之，文革的缘由与祸害，都可归结到意识形态，文革是另类的共产革命，是意识形态癫狂，所谓触及灵魂，其实是主义幻灭。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与世界的面貌已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垮台也20多年，国际共运已寿终正寝，不存在所谓“高潮”与“低潮”。毛死后中共改变路线，改革开放，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现中国经济已跃居世界第二，这在毛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试想：“大跃进”全民大炼钢，两千万吨的指标也完不成，如今搞市场经济，中国年产钢7—8亿吨，产能过剩要限产，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威力，

由此可见一斑。而这在文革，却是要遭痛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左意识形态吹牛说假，颠倒黑白，祸患无穷，不改弦易辙，只能是死路一条！

然而，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对极左思潮意识形态根源不作深入剖析，留下了严重后遗症。现在仍有人以教执鞭，鼓捣乌托邦愚民惑众，希冀回归老路，以致左风又起。邓小平淡化意识形态搞改革，从而“杀开一条血路来”，但仍有死硬分子不服输，要作困兽之斗，共产主义不能及身而见，就“继续革命！”叫嚷须“几十代人不懈努力”，这是对历史对人民不负责任。中国人受极左意识形态残害，吃的苦够多了，要吸取“空谈误国”血淋淋的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没有必要为乌有之乡再作无谓斗争再作牺牲了。被百年实践反复证伪的学说，该抛弃就果断抛弃，解开意识形态死结，“让思想冲破牢笼！”决不能让愚昧癫狂的文革，在中国再次上演。（2016·1·10）

□ 原载《领导者》总第70期，2016年7月出刊

~~~~~

## 【研究动态】

### 推进文革史的学术研究

• 金大陆 •

#### 一、文革研究须“去意识形态两极化”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研究路径上必须警惕和克服“图谱化倾向”（亦称“脸谱化倾向”）和“意识形态两极化倾向”。前者主张坚持历史学史料为本的原则，即通过大规模开掘“深部和细部”的史料，力避既不着根基又不着边际的空谈；后者则指出当前关于文革研究往“左”和“右”两个端点上拉扯。“左”的倾向是“重要遗产”说，即认为文革具有人民自下而上追求平等的遗产价值，此属辩护思路；“右”的倾向是集体罪错说，即指认文革是高层政治集团的集体罪错，此属终极性的批判思路。两种倾向皆充满着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更令人担忧的是与当代中国政治的趋动紧密勾联。所以，我们主张文革研究应标示学术至上、学术独立的原则，与各种意识形态的特征实行切割，因为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立场”、研究的“方法”是可以剥离的。这就是说，即便“意识形态革命”是凸显的主题，却不可以是研究的引导和目的。

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在此，我以为去意识形态两极化有两个向度和两个关节点。

第一，研究文革运动时，去因参加不同派别而形成的立场和观点（也称“派性”）。别看文革运动过去40年了，在大大小小的文革人物，纠缠过往的人与事；牵引过往是与非，甚至沉浸于其间，耿耿于怀的大有人在。

这种情况尤其对有文革经历的研究者来说，无形之中会形成障蔽，许多民间文革出版物，包括口述采访都存在这种倾向。如果过多地依赖、引用这些材料，而不做“去意识形态两极化”的处理，肯定会影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

第二，要与当下关涉政治路线的“左”、“右”两路的争论进行切割。

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是对文革运动的拨乱反正。然而当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就浮现而出了。于是，在民间，尤其在网络上，甚或在学术界，大凡一个方针、

一个政策，乃至偶然发生的一个事件、一个事故，除了官方的统发稿报道，多会引发广泛的议论和争辩。说到极端处，其观点之偏执，态度之激烈，语言之粗暴，几乎复演了文化大革命的形态（诸如“五毛党”和“带路党”之类的称谓）。

就此，我们要与当下的各类“意识形态两极化”的政治纷争保持距离，尤其面对一些直接关涉文革运动的话题，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或“左”或“右”的两路撕裂所干扰，一定要相信：“只有学术的，才是有力量的。”

一个关节点是：“去意识形态两极化”就是坚持“以史实探求真相，以理性总结经验教训”的立场和态度。作为文革史研究的学者，还关乎“本质性与多样性之统一”的关系问题。

一个老学者告知我的例证，大概可说明问题：有这么一对父子，父亲是文革前上海一高校的领导，儿子当时是小学生，现在也成为一高校的科研人员了。一次儿子在父亲家翻看相册，突然看到一张照片，是文革初父亲挂着牌子被批斗的照片，再定睛一看，发现揪住父亲的红卫兵正是自己学校的现任领导。儿子很恼火，对老父亲说：怎么是他，应该告到纪委去。但父亲对儿子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住这张照片，我心里是非常感谢他的。那天是校领导集体挨斗，挂在胸前的牌子做得又大又重。我们一低头，胸牌上的铁丝就直接挂在脖颈上，勒得很痛很痛。结果这个红卫兵压低声音对我说，你不要动，然后趁会场上喊口号的时候，把那个铁丝拉起来，挂在我的棉袄领子上。后来又滑下去了，又被这个红卫兵拉上来。所以我是非常感谢他的。

其实，深入挖掘此类例证是不少的。这是“真相”吗？如何解读这种“真相”？

批斗确实反映了文革造反运动的本质属性，现在又开掘出了人性良善的细节。请注意，这些细节可不是用来否定文革运动残酷的本质，而是呈现、印证了“真相”的多面性和立体性。这就是说，探求文革运动（事件、人物等）的真相，不是浮皮潦草就可以塞责的，它还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深入到过程中、细节中去，既把握问题的本质性，又发现问题的多样性，并将两者统一起来，才能求得一个完整版的“真相”。

关于这个内容的第二个关节点是：每个研究者都是有倾向的，或者说是隐性的，只是表达的取向和程度不一样，提倡在文革研究中“去意识形态”，研究者隐性的观点和态度难道“空无”吗？

我以为，除了提示和警惕以外，就应该从原则和程序上来考虑了。回答如下。关于文革研究可以设定一个前提：每一位思维正常的文革研究者，应该认同1981年《决议》这个底线；每一位思维正常的文革研究者，应该认同改革开放的战略（问题伴随而存在）。按照一般的归类，所持政治立场，无非是“左”、“中左”、“中立”、“中右”、“右”等。所以，若是突破《决议》，若是否定改革开放，此问题也就很难谈下去了。当然，估计有人会反驳：你坚持所谓《决议》的底线就是“意识形态化”。若是这样的认定，那么首先是尊重对象的发言权，再提出学术化的“规则”问题。

由此，我认为关于文革研究学术化应该设定一个规则：这就如同法律上讲“程序正义”一样，即不管你持何种立场，你所研究的题目、使用的材料、论证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甚至包括论文的格式和语言，都必须以学术化的样态呈现。通俗地说，就是你如何书写？既不是空洞无物地叙述，又不是单向度地取材，更不能上纲上线地谩骂。要凭材料说话，要有分析、有理论，实事求是地讲道理。这就是以学术化的规则来倒逼“去意识形态两极化”。凡

是文革研究者，都必须限制在学术化的规范中写作或者争辩。从这个角度说，学者的引领和示范的责任重大。

现在有“公共史学”一说，就是学术性质的小众研究如何通过各种媒体，以通俗化、公众化、普及化的形态进行传播。照理说，只有小众的学术性质的研究积累得厚实了，才可能有效地放射到公共史学中去。但文革研究的境况不是这样，学术性质的研究很难展开，属于公共史学范畴的文革叙事的表达不仅单薄，一派脸谱化的倾向，而网络上的杂说却层见叠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以为只有健康的学术性质的文革研究展开了，研究成果扎实了，杂说才会平息下去。

## 二、文革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继续革命”

如果说中国革命是以农村—农民为中心（土地革命战争，农村包围城市）；那么中国的“继续革命”就是以城市—学生（工人）为中心的，尤其在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策源地），及所有的省会城市。我以为这样的判断（或称“范式”）可引申出新的研究路径，即这个从革命到“继续革命”——从农村为中心转到城市为中心，其中的关系和理论很值得我们思考。如中共进城以后，在“城市化（现代化）与革命化”的方向上出现的问题；中共在城市管理方面出现的种种适应和不适应；城市学生与工人的综合状况（身份、文化程度、劳动方式、经济收入、价值倾向、社会关系等等不同于农民）；对“继续革命”的认同与不认同；在城市爆发“继续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中国革命（农村为中心）与“继续革命”（城市为中心）的相联性和相背性；毛泽东与城市化的关系。以及文革中各大城市的供应问题（粮油、蔬菜、副食品生产与“国家管理在位”）；城市居民生活的问题（“非常中的正常”与“正常中的非常”）；不同城市的地理、历史和文化传统与文革运动态势的关联等等。

最近，张济顺教授在他《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一书的前言中提出问题：上世纪50年代与文革时期的60、70年代有无特殊的涵义？

循着以上的思路，我以为：50年代的主题是“革命的继续”，即1949年军事的胜利赢得了政权，中共革命的重心便从农村进入了城市。此时，中共展开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国民党的残留势力，以及新政权的建设，可称为毛主席所说他人生的“第一件大事”。包括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其性质是从政权的革命转向了社会的革命。

相较于上世纪60、70年代，我以为该时期的主题是“继续的革命”，即中共经历了文革前17年“革命的继续”后，以毛泽东为首的高层不仅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更在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中强调：在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同时，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就是说，60、7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阶级斗争的矛头有“在社会”和“在党内”两条线，且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称为毛所说人生的“第二件大事”。以至文革这10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学家永远的探讨和追问。

从50年代的“革命的继续”，到60、70年代的“继续的革命”，其间从进城、执政到体制的建立，再到1964年毛泽东在批注中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整个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的重心，基本围绕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心城市而展开。正是这个“空间结构”的所在（内含政治的空间和历史的空間），一定程度地决定了“继续的革命”的对象、形态、规模和特征。

总之，确认文革的发动和展开，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思路，或许是一个解释的路径。

### 三、取得呼吁忏悔和化解仇恨的共识

我们强调文革研究回到学术轨道，就历史学者的目的而言，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复原这场运动的真相，并探求这个真相背后的奥秘，这也就是我们的学术旨趣和追求。当然，一些政治学家和管理干部一定会追问：历史学家研究文革运动的政治意涵和政治目的是什么？

请注意，我在此不是特别的借问，而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确实遇到了太多的政治质疑。在一些人的判断中，似乎我们的工作是为了某些不好的目的。其实，在我的内心里，研究文革的学术目的，超越于政治的目的。因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学术价值，是可以与法国大革命史、俄国十月革命史（文革史与这两段历史存在深刻的渊源关系）、与二战史研究相媲美的。

追问下去，我们研究文革的政治目的，决不是为了控诉或者以暴易暴，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避免政治动乱，促进社会和谐。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唐少杰教授所在的清华大学的文革研究进行得最深入，水平也最高。原来的两派都有人参与研究，而更为重要和典范的是大家在复原真相的基础上，达到了和解，开创了新的政治生态。

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也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文革中的人物。例如我和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还有李逊女士曾努力促成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即“工总司”的人员，与工人保守派，即“赤卫队”的人员；还有上海“红革会”的负责人与“孙悟空”的负责人等，能坐在一起碰头叙旧。我们想创造一个和解的场面，结果却是被以种种借口回绝了。也有反省者、释怀者，比如，上海中学生红卫兵领袖人物红鸥和高静慧等，就做得比较好。

下面着重从理论上总结文革的教训。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多是以残酷斗争和彻底清算为主臬，多是以仇恨对仇恨，以暴力对暴力为主导和手段的。今天，你是战胜者，就以仇恨和暴力的套路清算失败者；明天，你是失败者，就遭遇战胜者同样的清算。如此循环叠加，没有宽恕，没有退让，没有赦免，没有化干戈为玉帛，我们的教训不惨痛吗！

我非常推崇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读原江青秘书阎长贵《我参与了打倒陶铸》的忏悔文章后，写给阎长贵的信（见2012年第7期《炎黄春秋》）——请允许摘录以下两段：

一、文革是党和国家的灾难，就大多数人而言并不存在个人恩怨。我也做过错事，如在天安门向毛主席告邱会作的状，致使全军文革垮台。但这不妨碍我与邱会作儿子友好相处。文革中，我也必须要喊打倒“刘邓陶”，何况您？……你可是实实在在在秦城蹲了七年大狱啊！但你不记私仇，仍能客观对待江青，让人感佩。

二、我们总是在强调要实事求是，可永远也做不到实事求是，这真是困扰我党的一个悖论。江青纵然作恶多端，但说她反党反毛泽东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我曾对江青恨之入骨，认为我们家破人亡皆因她的陷害。但慢慢地我开始理性思考文革，觉得这种将文革浩劫一股脑推给江青和“四人帮”的做法，善意的解读是为尊者讳。

曾经被逼得家破人亡的陶斯亮面对江青尚且如此——是否应进一步提议：在确定文革的性质是一场政治灾难的前提下，文革研究应同时建立呼吁忏悔和化解仇恨的共识呢。

呼吁忏悔容易被大众接受，也符合多年来形成的社会思维的惯性，而确立化解仇恨的意识则可能很难，甚至可能产生曲解。但这确实是文革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当然，确立化解仇恨的意识并非说不要揭露和控诉文革的罪孽，而是指不要简单地引向仇恨的向度，不要简单地通过仇恨的意识来解读文革。文革的复杂，不是仇恨能够说清楚的，恰是应在开掘导致文革灾难的多元性要素和多面性关系方面下足功夫，致使整体化的文革运动，在历史学学术的框架中全面地沉淀，经过科学的提炼，再全面地呈现，从而为整个民族记取这个灾难和教训，打下一根不可动摇的历史定论的桩柱。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那些碎片化的文革描述所支撑起来的仇恨意识，不仅遮蔽了把握文革全貌，透视文革真相的眼光，更容易积累起类似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情绪。其实，不管是从现实政治的方面，还是从历史学术的角度，都是很不可取的。因为仇恨的意识更容易引起“左”路的反跳，干扰改革的方向。何况狭隘、偏执和激进的观点，根本不属于现代意识的表达，不符合人类文明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呼吁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轨道，实际上也承担了化解仇恨的任务。

#### 四、培养年轻学人占据国际学术制高点

我们坚守在这块是非多端的地方，更有种种学术之外的猜忌和干扰，但我们甘心情愿承担之。第一，从大的方面讲，这项研究对国家进步之伟业，民主与法制之建设太紧要了，尤其面对当下关于文革评价的种种乱象，必须有正面的学理性的研究来占据论坛。

第二，文革研究是长久的话题，是历史学家永远的追问。从长远的时段来看，今天的研究只是起步和拓荒。所以，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要有一种志愿精神的承担和情怀。

最近报道上海首次评出了自然科学特等奖，并就坚持持续性研究方向，提出“寂寞长跑”的概念。联系文革研究的时下境况，我认为在“寂寞长跑”的同时，还要加上“抗风险长跑”、“抗委屈长跑”等含义。

文革研究受到世界学术界的关注，是世界性的话题，我国学者一定要在国际学术界掌握话语权。我们这一辈学人可以在“寂寞”中长跑，且最大的优势是专业知识尚可，有理想、有进取心，工作刻苦，不计报酬。所以，就文革研究来说，在这一辈学者面前，国外的学者是难以超越的。“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不成立，要靠我们这辈国内学者继续做出够水平的贡献，才可能使中国文革研究居于领先地位。我担心的是下一辈，即没有文革经历的人们，当他们面对国外的同辈学者时会怎么样呢？我在社科院历史所带的一个硕士生，当年，我给他建议的题目是“上海文革时期的‘整党建党’研究”，我认为这是“枢纽”级的题目，迄今为止，还从未有学者碰过，我掌握的大量材料可以提供给他。结果是题目太敏感，这个研究方向会耽误他的生计，只好确定了被广泛接受的“知青研究”的题目，就比较安全地上路了。即使如此，仍然是资料难、发表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坦然地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与此同时，国外的年轻学者却在很快成长，或许很快能占领这个领域的高地。天长日久，我国的年轻学者将可能在这个领域失去发言权。

现在国门打开了，外国学者进入已不困难。德国青年学者丹尼尔在潘家园购买了北京某学院的大批文革档案就是例证。在瑞典隆德大学的文革研究工作坊上，丹尼尔和杰路米都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革研究的专著。这些年，还不断有外国的年轻学者来国内或进行学术交流，或请求学术指导，曾经找过我的就有韩启澜的学生在做大串联，陈兼的学生在做文革时的外交，一位来自英国的留学生在做文革动物型漫画，来自澳大利亚的留学生

在做文革日记，还有不少做知青研究的。国内年轻学者将落后于国际同行，已不是杞人忧天。

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局面。但我相信只要在掌控的尺度上有所微调，局面就会改观，因为天时、地利的因素终究在我们这一边。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原载《炎黄春秋》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